

里耶秦简： 世界上第一份“九九”藏在这里

2002年6月，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县衙内一口不起眼的水井里，随着3.7万余枚秦代简牍重见天日，为我们事无巨细地“汇报”秦代人民的工作与生活。恰如单霁翔所言，“北有兵马俑，南有里耶秦简。”这批看似不起眼的竹木片，是我们了解秦代人民生活实况的信息宝库。

加上2005年12月新出土的51枚秦代简牍，“里耶秦简”数量达到此前发现秦代简牍总和的10倍，字数达到20万字，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期间洞庭郡迁陵县县政府的档案文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 据《北京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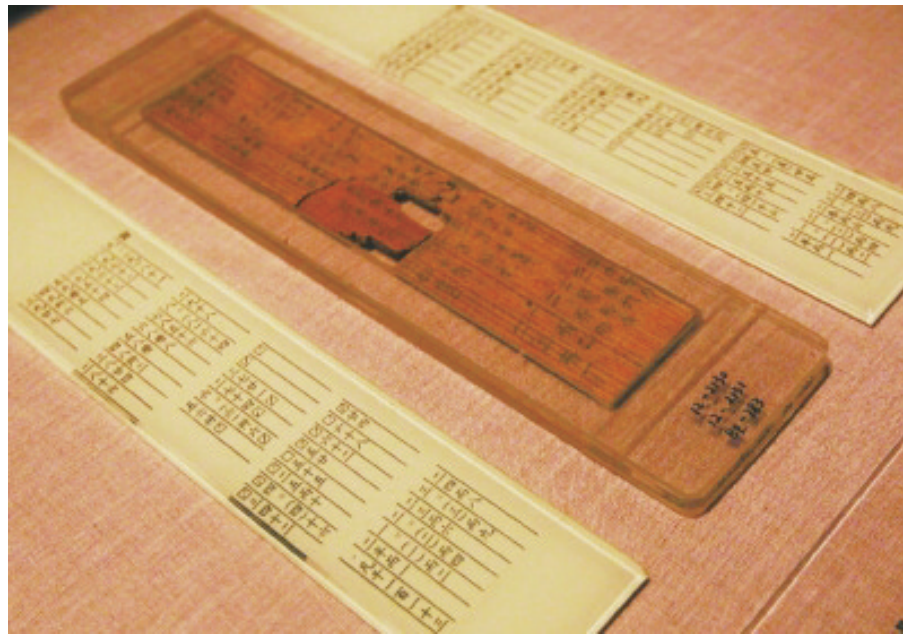
A 记录着每一位居民的信息

湖南省龙山县位于武陵山脉西侧，地处湖南、湖北、重庆三省交界处，而里耶古城位于龙山县最南边，离龙山县城尚有120公里之远。在古代长期处于“五溪蛮”“武陵蛮”的势力范围。里耶秦简的发现，证明秦代郡县制在全国都无差别施行，即便是在南方的边远小城，行政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就有人兢兢业业地记录着每一位居民的信息，执行着《长安十二时辰》中神奇的“大案牍术”。

根据简牍记载，里耶人民在当时属于洞庭郡迁陵县某乡南阳里。“里”基本上就相当于今天的村居，可以看出秦朝的编户制度非常严密。不过，里耶秦简虽然注明每个人的爵位，却并不登记年龄、身高，或许是因为这批户籍简是在秦灭楚不久后编制，还未来得及完全统计。

从户籍简反映的内容看，南阳里的编户民大约有20余户，涉及的姓氏有7~8个，里居呈现异姓杂居的形态。编户民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为主，也有联合家庭。奴仆属于户籍的附属人口，女性奴仆可以嫁给主人做侍妾。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社会主体都是血缘氏族，从战国初期开始各国纷纷变法，加强对个体家庭的直接控制，秦国商鞅变法就规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南阳里的编户民状态，可以证明这种政策在民间已经落实。

在这批简牍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地名：“洞庭郡”和“苍梧郡”。里耶古城所在的南阳里属于洞庭郡迁陵县某乡，而里耶秦简同时又提到“苍梧郡”。这两个郡在传世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但这“三十六郡”究竟包括哪些？历代众说纷纭，但均未提到“洞庭郡”与“苍梧郡”。里耶秦简证明了这两个郡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文献的长沙、黔中郡当是洞庭、苍梧郡的讹误，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存在先后改名的现象。



“里耶秦简”所记载的世界上第一份“九九乘法表”

B 世界上第一份九九乘法表

里耶秦简里，还藏着世界上第一份九九乘法表。要说九九乘法表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估计很多人并不清楚。《管子》曾有一种说法，“宓戏作九九之数以应天道”，九九乘法表居然是上古伏羲发明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不过，据《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招揽人才，有个人自称会九九乘法表。齐桓公笑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人说，如果我只会这个，您都肯聘任我，那还怕没有人才投奔吗？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应该就有了九九乘法表。

不过文献只是文献，需要考古才能确证。在20世纪，出土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均记录了“九九乘法表”，由“九九八十一”开始，到“一一而一”终，与今天流传的基本一致。而里耶秦简的发现，则证明

战国秦代时，九九乘法表就已经通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乘法表实物。《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李斯、赵高、胡毋敬作文字读本，秦政府颁行给天下学童学习，而里耶秦简的发现，证明当时除了“语文课”，更有“数学课”。

里耶秦简还记载了最早的“祠先农”活动，这是秦代从中央到郡县各级政府组织的祭祀活动。先农是主管农业的神，对于先农的祭祀，在传世文献中最早可以到汉朝，而如今北京也有明清时期遗留下的“先农坛”。在更早的周朝，人民祭祀的是田神，还没有“先农”的称呼。1993年在湖北荆州出土的周家台秦简即证明秦代有“祠先农”的活动，略早的里耶秦简则又一次进行了证明。大约秦人希望取代周人的田神后稷，所以把“先农”置于后稷之上。

庄银安：疏财报国 叶落归根的“民国元勋”

在厦门市海沧区，矗立着一座古朴素雅的洋式小楼，白墙碧瓦、翘角飞檐，楼牌上书有“映碧轩”三个大字。似乎在向人们讲述“民国元勋”庄银安波澜壮阔的一生。

庄银安(1850~1938)，字吉甫，号希复，出生于福建同安县角美乡鼎美祥露村(今属厦门市海沧区)。胸怀大志的庄银安，少年时期便离开家乡南渡缅甸，在当地进行大型农业垦殖，创办源记棧号，事业发展迅速。

孩童时期，庄银安常听从南洋归来的同乡说：“外国人欺我侨民殊甚！”此次南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悉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多番体验和感触后，庄银安的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

20世纪以前，全缅甸并无一所华侨学校，广大侨胞渴望有自己的华文学校。1904年，为传播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庄银安与陈甘泉、徐赞周等筹资在缅甸创办中华学校(1907年更名为中华学校)，开缅甸华侨办校之先河。在庄银安等的影响下，至民国四年(1915年)，全缅甸创立侨校近百所之多。这些侨校的建立，不仅弘扬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培育和输送革命人才，组织和支持革命斗争。许多就读过侨

校的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毅然投身革命武装起义的行列。

1908年，同盟会缅甸分会成立，机关就设在中华学校，名曰“演说社”，经常宣传革命道理，促进学生民族思想的发展。8月27日，作为同盟会缅甸分会机关报的《光华报》出版。庄银安领导的同盟会缅甸分会，运用《光华报》和“觉民书报社”等阵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号召盟员和广大侨胞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08年4月河口起义之前，庄银安等就带头捐输军费，发动华侨捐款，购买武器弹药，秘密运送河口，支援起义。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缅甸分会在仰光召开筹饷大会，分批汇回国内。据不完全统计，庄银安主持的同盟会缅甸分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组织和发动广大华侨捐款助饷共80多万港元，有力地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庄银安被推举为南洋同盟会的代表，携带各埠同盟会的数万捐款赶回厦门，帮助解决家乡的财政困难。厦门各界推举庄银安为参议会议长，民国政府先后委任他为“福建都督府咨议顾问”“稽勋同名誉审议”。他满腔热情，积极参与革命和善后建设工作，希望能“革故鼎新，福国利

民”。但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复辟帝制，令他愤然返回缅甸仰光，重操工商业，创办大同油厂，数年间获资巨大。他热心公益事业，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被推举为缅甸华侨公会会长。

1931年5月，82岁高龄的庄银安在清理完缅甸的商务后，回到故乡定居。回乡定居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委任他为中央华侨委员会委员、福建侨委代主任。

回到海沧祥露村后，庄银安关心乡亲生活疾苦，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他捐资兴筑三座“路亭”，供家乡农民休息、乘凉；为了改善家乡的卫生状况，他又捐建三座带屋顶的公共厕所；在自家小楼底层，建“清凉亭”，置石桌石椅，供乡亲休憩。

1938年，庄银安病逝，享年89岁，葬于祥露村南面一处坡地。

2004年11月，厦门市政府将庄银安故居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厦门名士薛一尘为庄银安的瓷画像题赞时写道：“北游南海，非为人师，而诚毅所薰华夷佩之。晚归梓里，奋臂匡时，自忘其身而公利是图，斯真得天独厚大勇无私宜。”这是对庄银安一生最为贴切的评价。

□ 据《人民政协报》